



论语新读

有些有权有势品德卑劣的人。男人分君子小人,女子也分君子小人。在统治阶层的妇女中,有些妇妾之流,互相争权、争宠,道德败坏、祸国殃民的并不少。”

其四,文汇报读书周报《“女子”问题》一文说:“这句话其实是标点错误。‘女子’中间应有标点断开,如‘女、子’。‘女’指的是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儿子,‘小人’指的是君主周围的宠臣、佞臣、佞伶、宦官之类。”

其五,《发现论语》说:“女:母亲,家庭主妇,家庭的维系者,这是‘女’的本意。女子:母亲的儿女,还在母亲怀里的儿女,也只有依靠母亲的照料喂养才能生活的儿女,也即幼儿幼女。”此说未涉及“小人”。

其六,《论语我读》说:“女是妇女统称,在父母家是女出嫁则为人妇。子,籀文(略),像初生婴儿之形,满月则曰小人,闽南语及客家语至今仍沿用。”又说:“父母养育子女,要算初生婴儿及满月至周岁的幼儿,最不易抚养,若时刻不离左右,则柔顺乖巧,若稍有远离,儿就会放声大哭。”与此相似,《论语典藏本》说:“我认为孔子所讲的难以相处的人,实指女孩子和男孩子。”此说不仅把“女子”“小人”都解释成孩子,而且分了性别。

以上种种,应该说并无文本依据,属于个人体会,有的纯粹是主观猜测。因此,众多严谨学者在翻译此章文字时没有在“女子与小人”的概念上作文章,女子就是女子,小人就是小人(绝大多数理解为品质恶劣、道德低下之人)。不过,在具体理解中心意思时却相差很大。拙文仅作如下归纳。(上)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白子超

阳货篇载:“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唯,范围副词,表示它所限制的人或事的单独性,相当于“只有”。

养,《尔雅》曰:“颐、艾、育,养也。”育,养互训,即养育,引申义之一便是教育、教养、熏陶,如“立太傅、少傅以养之”(《礼记·文王世子》)。一些学者把养译成“相处”,那只能说是现代新发明的引申义。

孙,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曰:“子卑于父,孙更卑焉,故引申之义为孙顺,为孙遁。字本皆作孙,经传中作逊者皆非古也。”孙通逊,义为恭顺。

此章并不难译: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教养的。亲近了他们,他们就不恭顺;疏远了他们,他们就怨恨。”然而,这种话太容易被人诟病,于是许多学者为尊者讳,认为“女子”和“小人”不是全称概念,而是特指,其中有些说法十分新奇。仅据笔者手头资料的不完全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宋代邢昺说:“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文母之“文”是美义,文母即有美德之母,初指周文王妃太姒,后亦用作帝后的美称。此说把少数特殊女子排除在外,实际上仍属于“女子”是特指的判断。

其二,宋代朱熹说:“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蓄之,则无二者之患矣。”朱熹博览群书,学问极深,知道明说“女子”为“妾”没有根据,但他话里的意思就是指“女子”为“妾”。自此,古代和当今众多学者都把“女子”解释为“侍妾”,把“小人”解释为“仆役”。

其三,《论语说解》说:“孔子这里说的‘女子与小人’不是一般人,而是指那

的前廊,里头的装修也是吊顶射灯什么的,家具也是沙发席梦思床全盘现代化,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包括开通宽带的新款电脑——那是给孩子们置的,他的儿子去年已经考上大学,在机场地勤配餐的闺女能唱英文流行曲。但是新派的儿女绝对尊重父亲的那根赶大车的长鞭。我和歌鞭儿坐在那根鞭子下面的沙发上,聊过许多旧事新闻。

活在当下,莫忘从前。人在高楼,需接地气。歌鞭儿在我“温榆斋”里,看到过大桶的鬼差花,知道我所爱,于是,有一天,当我回到城里“绿叶居”,正整理书稿时,他飘然而至,汗津津的,手里拎着个好鼓的蛇皮包,他用粗壮的胳膊扇大的手掌,从里面取出一样东西,咧嘴宣称:“包你喜欢!”

这就是大角瓜的来历。



夜光杯

口拉的大车被彻底淘汰,车把式也不再成其作为一种职业,歌鞭儿眼下在村旁的商品楼区改做水暖工。他前年挥泪别骡马大车的事情,好长时间都是人们的谈资。四年前还偶尔有人来请他用骡马大车拉东西,三年前就完全闲置了,他固执地养着那骡那马,没东西可拉,就自己驾着大车去村外道路上转悠,俨然一道奇特的风景。前年有人牵线,百里外还用骡马大车的车杆里,来了个跟他同龄的

中年汉子,把他的骡马大车整个儿买走了,人家赶着骡马大车走的时候,据说那骡马不时回头望他,他痴痴地望着牲口大车远去,人家都拐弯没影儿了,他忽然用两根手指弹去腮上的泪珠,脖子上几根筋暴起老高,粗声高喊:“你得善待!”歌鞭儿只留下了长长的、梢上缠着红绒线的竹鞭儿,就斜挂在他家客厅的正墙上,形成一个非常夺目的装饰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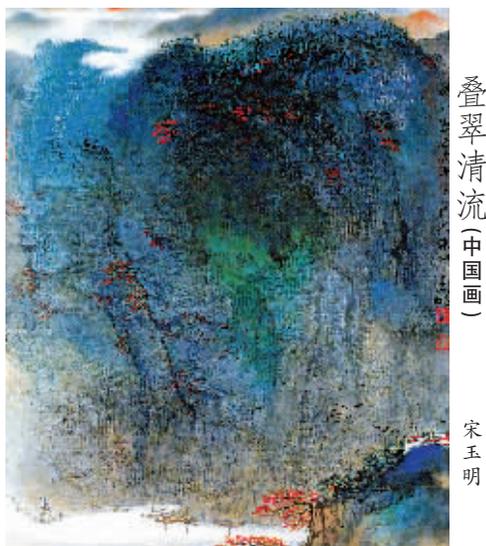
不要以为歌鞭儿是个守旧的人。他家头几年翻盖的大房子,正房七间以大落地玻璃门窗封住阔大

抨击别人在室内布置上的全方位的高追求。

我爱我家,我家我做主,正所谓“关起门来当皇帝”,“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可着脑袋做帽子”。城内居所,我把它叫做“绿叶居”。经过一番重新装修后,因为心境的新状态,其面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现在很少在家中待客,一般社交活动都约在外面咖啡馆或茶寮。但偶尔也会在家接待某些人士。一位熟人乍进后表示不解:“你原来那些摆设都哪儿去了?怎么成了四白落地?”环顾一番之后又说:“如今西方风行简约主义,你是不是又想得风气之先?”

那位熟人在我客厅里,发现一只大角瓜,附身去摸以前,这样揶揄我:“原来你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啊——别的摆设全收起来,单拿这玩意儿骇人眼目!是什么玉料雕的?不是玉也是琥珀,这么大的个儿,价值不菲吧?”抚摩细观后叹道:“真是农作物也!把它斜放在壁挂式等离子电视机旁,相映成趣啊!”

我说:“接接地气嘛。”大约十年前,我在京郊农村置了一个书房,取名“温榆斋”。“温榆斋”附近有农田,有湿地,不仅有田野的气息会沁入书房,更结交了几位村友,感受到淳朴的人际温暖。村友中,最人高马大的是歌鞭儿,鞭儿自然是个绰号,他原来是村里的车把式,随着他们村的变迁,牲



叠翠清流(中国画)

宋玉明

室内装饰,各人趣味不同。二十几年前,我很喜欢在室内摆放种种旅游带回的小摆件,意在望之可回味旅途中的美滋味,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些堆砌。那时一位名画家来我书房小坐,环顾后说:“我拿点东西来给你摆放吧。”我听后那是对我室内装饰的含蓄批评,当然也表达出一种真诚的善意。

去别人家做客,有一次见主人家中满壁名家字画,主人说,平时绝不悉数挂出,甚至全部收起,只挂些非名家的一般字画以作装饰。那是懂得收藏的人士。一次在国外赴“派对”,主人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

大角瓜

刘心武

慕。家中摆设,当然是一种符号,精心地摆设,则构成一个符号系统,这系统传递出的信息里,除了审美品位,当然可以还有身份与财富的显示,这很正常。我绝不能自命清高,因为自己无条件提升自己室内装饰符号的“含金量”与“含金量”,就去讥讽甚至

画家宋玉明近年颇多海外游,然而让人羡慕的是:当其尽兴而归之日,正是画稿盈笈之时。万里游踪,行色匆匆,饱满的创作热情着实让人叹服。宋玉明生于江南,自幼受教于父亲——山水画家宋文治。秉前贤之余韵,每每多写春雨芳菲,笔下洋溢着江南的湿润之气,其画如其名:山明水秀、温润如玉,一派秀丽空灵的典雅气息。然宋玉明是不易满足的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他移居深圳,这个新兴都市的快速发展,使他深切地意识到其身处空间的异彩纷呈,他以艺术家敏锐的触角对城市景观的表现作为自己山水画艺术的新一轮追求。自然/环境/城市——这一现代人文观念俨然是宋玉明艺术创作新的起点,而这次所见的新作可视之为他近年来在城市山水画创作的延续。

以中国山水画的形式来表现异域,是20世纪中国画发展进程中一个崭新的课题,李可染、关山月、傅抱石、亚明等都作了不同的尝试,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细读这些作品,就会发现他们在描绘异国他邦的景观时,往往会自觉地调整视觉习惯和表现方法,甚至自发地超越自己艺术趣味的界限,表达他乡的异样情调。宋玉明也不例外。

他以遥望的视野来观赏异乡的景观,准确地把握不同邦国的风情和趣味,大胆地采用了中国画写与放、实与虚的表现手法,通过色彩的表意使景观显得更加淋漓尽致,别具一格。如表现日本富士山的壮观;大涌谷的水墨滃然与清寂幽淡;芦之湖黛青的典丽悠远;突尼斯凯鲁万赋予裙裾的富丽堂皇;以闪烁跳跃的色彩尽显一些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他的这批作品回避了传统的形式和技艺,直抒胸臆。作品中墨色勾染兼容并重、无拘无束,色彩和水墨的变化浑然天成,弥漫着传统风骨的凄迷写意和现代品质的印象即兴。《香江晨韵》画面水气淋漓的即兴发挥,带来的是水墨情韵宏大的感染力,以其畅美、细腻抒情方式,创造出丰富意象,糅和了中西的表现手法,使之更加绚丽而多彩,其所追寻的那种鲜活的绘画语言正是他温文尔雅、含蓄中和的抒情方式。他借助这种远观的朦胧把握,给人留下了广阔而丰富的“臆想空间”。

宋玉明眼中的“远方”不但是个新奇迷离的异乡,还是个不失温情的心象,以至山一程、水一程的旅途均化为一节节色泽缤纷的记忆段落,叠映着古典和现代的重重印迹。在色墨中留痕,从“渐行渐远渐深”的旅程中融入舒缓悠游的水墨天地。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个体经营者。这些年,我先后资助了9名特困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跟我很亲热,称我为“刘妈妈”。肖文娟、肖雨娟两姐妹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患病住院,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几乎难以为继;知青子女吴阳阳、吴毛毛兄弟,父母离婚,他们跟着已丧失劳动力的父亲生活,靠帮困卡买来买油,艰难度日……看着这一个个原本应该无忧无虑成长的孩子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困难,我心里既焦急又难受:要是没有人资助他们,他们就有人辍学,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我应该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这些孩子们,使他们能够有机会好好读书。我决定先帮这些孩子解决学费问题,给他们买一些学习用品,然后逐渐在生活各方面多些关心。

有个叫汤华椿的学生给我印象很深,他父亲去世,母亲残疾,家庭生活极度困难,孩子已准备辍学打工,养活重残的母亲……我除了补贴他学费外,逢年过节,都叫他来我家吃饭。这孩子比较懂事,平时不舍得买东西吃,我要是去超市,总会买一些东西送到

他家里。记得那年冬天,我从电视上得知冷空气南下的消息,立即想起孩子没有御寒的衣物,就赶紧托人买了两件滑雪衫连夜送到他家。如今,汤华椿已经顺利毕业并且踏上了工作岗位。当他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就买了一盒保健品送到我家,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再过度操劳。这礼物在我看来相当珍贵,因为它代表了孩子最诚挚的孝心。我

为社会奉献爱心

刘玉璞

对他说:“不要回报我,要回报社会!”

除了孩子,我还给其他一些人送去温暖。有一年元宵节,一些孤寡空巢老人没有家人陪伴,非常孤单,我就寻思搞些有趣的活动丰富他们的节日生活,邀请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马秀英来社区为大家演出。看到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得到了一种内心的满足。

韩廷利是知青子女,他的爸爸早年生病

去世了,母亲患有智力障碍,且自己因车祸后遗症而严重影响行走,母子俩仅靠280元的低保艰难度日,家庭十分贫困。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自己的情况再困难,也比他们好多了,我想前后,我停掉了手机,缩减家里的生活开支,每月省出100元补贴给小韩,钱虽不多,但我相信这能给这个不幸的家庭送去一份温暖和希望。

社保队员倪学云为追捕逃犯摔成重伤,生命垂危,我自愿拿出些钱,并倡议为他募捐。大家对见义勇为英雄都十分敬佩和关怀,纷纷捐赠自己的心意,最后将筹集的3000元慰问款送到了他的手中。现在餐饮旅馆业竞争激烈,我经营的旅社、饭店不太景气,儿子和媳妇又先后下岗,小媳妇又患肿瘤,家里的经济状况大不如前,甚至经常入不敷出,但我愿意奉献一下自己的爱心。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我赞助的金额不比往日,但只要我还有半口饭吃,我就要分半口给贫困人员。

积小善而成大德

十日谈

积小善而成大德

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内,保存着一块明代万历九年(1581年)的珍贵石刻,上面有这样的记录:“先年,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倭寇等,阵亡数僧。”此系指明代后期海防松弛,倭寇频繁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在来不及调集正规军的情况下,便征召地方武装助战,少林武僧毅然迅速奔赴前线杀敌。因而,郑若曾的《江南经略》说:“癸丑之春,倭寇初至,际久无兵可御。操江都御史蔡公命少林僧天员领僧兵殄灭之。”

对于少林武僧在沪顽强抵御倭寇的经过,顾炎武的《日知录》称:“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云:“山东应募少林僧,叶榭江湾敌队乘。七尺棍长斤斤重,战场陷阵勇先登。”《松江府志》载:“倭寇从上海解围逃窜至松江时,兵备任率率乡兵及少林僧兵追至叶榭马家浜,打了个胜仗,斩获颇多;又继续追击到五里塘和习家巷,连打三个胜仗。”《南汇县志》载:“1554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农历七月,倭寇再次进据川沙,撤民居为营,打算长期驻守下去。参将卢镗率外地调来的兵士前往攻打,结果中倭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倭寇得势后,决定又一次侵扰南汇境地,此时正值少林僧兵前来增援,倭寇于白沙湾,少林僧兵人数不多,却个个勇猛善战,竟敢不顾身直捣敌营,毁倭寇停泊在岸边的舰船三艘,斩敌百余人,敌营大乱。”从这些叙述中,可以大致了解少林武僧英勇作战的实况。

少林武僧为消除上海一带的倭患,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明史·兵志》谓“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同时,又言“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当年“僧兵”的来源虽不局限于少林寺,但《吴淞甲乙倭变志》称他们“俱持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运转便捷如竹杖”,《明文海·舍利碑铭》提及,最早战死的是了心、彻堂、一峰、真元等四人。清嘉庆《松江府志》载:“四义僧舍利塔在余山之北,嘉靖癸丑知府方公廉所建。”在景色宜人的沪郊余山顶巅,至今依然保存着一些石塔构件,有关部门已经对它们采取了保护措施。

现在,上海不仅仍流传着少林武僧抵御倭寇的民间故事,而且还有抗倭遗址可寻,如南汇的“御敌楼”、松江的“得胜港”等。驻足于那儿,会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想起昔日少林武僧与地方军民并肩战斗的情景……

少林武僧在沪御倭

朱少伟

镇江北固山多景楼

杨逸明

飘然忽化鹭鸥群,三二相亲江水滨。山带春痕堪眷恋,花添诗梦更缤纷。狂奔白浪争雄急,雅集黄莺斗曲新。穿竹拂帘风窃喜,高吟又遇性情人。